



战后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变迁

李君哲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战后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变迁

李君哲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李君哲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10

ISBN 7-5382-5205-3

I. 战… II. 李… III. 华侨状况-世界-1945~ IV. D6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91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0³/₈ 插页: 2

印数: 1—1000 册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乔 平

责任校对: 房建永

封面设计: 宋丹心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定价: 15.00 元

2425/22

序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李君哲同志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祖籍福建省晋江市，是我的同乡。他早在二战结束初期（十七岁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新、马华文报刊（包括我参与领导工作的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反映华侨社会生活的小说、散文等作品。后因投入反帝反殖的斗争，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归国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专业，继而分配到辽宁省工作，深深扎根于富饶的关东平原。

他在沈阳市国有企业服务四分之一世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辽宁省计委经研所、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从事对外经济研究工作。由于他是第四代华侨，时刻不忘海外华社与国内侨界的命运与前途，所以几十年来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创作华侨华人题材的文学作品，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特别是海外华人经济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史，而且下定决心，坚持不懈，一干到底。

他是辽宁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学人，是辽宁省华侨历史学会历届的主要领导成员，经常撰写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论

文、研究心得在海内外发表；他也是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这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一书，是李君哲同志十多年来侨史研究精粹之作的汇编。纵览他的文章，总的印象是：立论公正，有理有据，资料翔实，文笔流利。应该说是辽宁省研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收获。随着形势的发展，君哲同志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取得更有分量的成果。

全 国 侨 联 顾 问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李君哲

1998年4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张楚琨
---------	-----

海外华侨华人发展史及与祖籍国关系概述	1
战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	29
略论海外华人经济	64
海外华侨华人金融业刍议	80
海外华人银行进军中国的态势与思考	94
华人社会现状与海外统战工作	103
海外华人经济与辽宁对外开放	117

* * *

东南亚华人经济巡礼	129
南亚三国华人经济一瞥	144
西亚国家华人经济掠影	150
东北亚两国华侨经济简介	153
发展中的美国华人经济	161
加拿大与墨西哥华人经济	180
中美洲国家华人经济	187
南美洲华侨华人经济初探	197
大洋洲四国华人经济素描	207

西欧华人经济综述	220
南非与毛里求斯华人经济点滴	239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采锡业的变迁	243
* * *	
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258
战前马华文学拾零	274
战后马华文学发展梗概	282
印尼华文文学沧桑	292
泰国华文文学今昔	304
菲华文学纵横谈	319
 后 记	 328

海外华侨华人发展史及与祖籍国关系概述

一、华侨及其出国原因

1. “华侨”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

在中、外史书上曾称“华侨”为“唐人”、“华人”、“中国人”、“中华人”，也有称之为“华民”、“华工”、“华商”者，其含义均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19世纪末叶才开始使用“华侨”一词，并经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会员的广泛传播，成为侨居海外中国人的通称。

二战后，又出现“华人”、“华裔”、“华族”等名称，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了。“华侨”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移居海外而仍保持中国国籍的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理应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华人”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移居海外并已取得当地国籍的人，他就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他就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保护（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正确的，而台湾当局迄今仍主张双重国籍）。但这并不排斥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民族立场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声援与支持（如阿拉伯国家人民对于别国公民中阿拉伯人、英美等安德鲁撒克逊族为主的国家对别国安德鲁撒克逊族的支持），当然不用政府名义

发表声明或抗议等；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华人按所在国的法律程序脱离该国国籍，重新申请为中国公民，而取得中国政府的保护。

“华裔”是指中国人的后代，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如前泰国总理、前菲律宾总统等都说自己有中华民族的血统等）；但和“华人”怎么区别呢？是个难题。有的专家认为，可以出生的代数作为划分标准，在当地出生五代以内为“华人”，超过五代者为“华裔”；有人主张以民族的意识、感情为标准，具有中华民族的意识、感情者为“华人”，否则为“华裔”；还有的学者提出以是否同中国有联系为标准，有联系的为“华人”，反之为“华裔”。总之，意见不一，界限很难划清。

“华族”则是指华人、华裔在所在国已形成一个民族（一般说，形成一个民族要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目前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使用“华族”这个名称。

2. 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

华侨出国的原因较多，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人民因战乱或改朝换代而大规模地逃亡到国外定居者共有6次：①唐末黄巢起义（公元875—884年），广东沿海有些人逃往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在南洋群岛出现了最早的华侨；②南宋亡国（公元1279年），一帮文武大臣流离海外；③明代后期因反对压迫而聚众出国，如万历二年（1574年）林凤率战船60艘进入菲律宾吕宋岛，万历六年（1578年）林道乾率众由台湾逃至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定居；④明清易代之际（1679年），明总兵杨彦迪等率兵3000多人投奔越南，开发东浦；⑤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部分太平军退入越南、老挝、泰国避难；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一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

和不明真相的富有者逃往东南亚、欧美等国。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外用兵，也常有战俘和失散的官员羁留外国不返回者。如公元 1288 年元朝同越南交战，在白藤江一役中，4 名元将及大批士兵被俘不归。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清军进攻缅甸失败，被俘 2500 人，羁留缅京，从事种植或工艺，娶缅甸女为妻等等。

第二，殖民掠夺方面的原因。

西方列强为了掠夺殖民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开拓垦殖，在欧洲禁运黑奴的条件下，便采取两种血腥措施掠夺中国劳动力。一是公开地抓捕，如 1619 年荷兰殖民者抓捕中国商船上的水手及商贩 2000 余人到吧城（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强制担负建筑、种植劳务，开发爪哇岛；1623 年在吧城的荷兰总督柯恩竟凶相毕露地发出指令：“现值季风正顺，须再遣战船往中国沿海，尽量掠其男女幼童以归。”“世间无如华人更适我用者。”

二是采取诱骗中国人“卖猪仔”供其奴役压榨。19 世纪中叶，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需要大批劳动力开发其占领的殖民地，纷纷通过其在华的洋行，重金雇用当地的流氓地痞拐骗沿海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卖猪仔”的方式下南洋当“伕”（苦力），最初每名是 3 元银洋，后涨至 8—10 元银洋卖给“猪仔船”运抵南洋各国口岸实行拍卖，每名到岸价格一般是银洋 120 元，最高价为 200 元。当地人贩子再转售给大种植园主、大建筑公司，单价高达 400—500 元。这些中国“奴隶”被打死、打伤或经受不住残暴奴役而自杀的不计其数。这种“猪仔工”起初没有什么期限，后来由于中国劳工的反抗才有一定的契约时间。据我国侨史专家的估算，当时每年出国的“猪仔工”与“契约华工”约有 300 万人，平均有 1/3（即 100 万人）死亡、1/10（即 30 万人）病伤残废，真是与非洲黑奴

一样的人类历史上的大惨剧。

第三，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因。

这是旧社会促使华侨源源不断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从中国方面看，人口过多，谋生困难（特别是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省份），如 1935 年广东省人口约 3000 万人，福建省人口约 1400 万人，共计 4400 万人。同年海外华侨 780 万人，其中粤闽籍的为 700 万左右（即占华侨总数的 90%），约占这两省总人口的 1/6（如仅统计广东的四邑、海南、潮汕、梅县和福建的漳州、泉州，则华侨约占这些地区人口的 1/3）。这些沿海地带山多地少，人口增长很快，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中、青年人，只好飘洋过海，投亲靠友，寻找生路。

从外部条件看，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需要吃苦耐劳肯于能干的劳动力，为其开发新占领的土地、矿井和森林等；需要精明节俭、善于经营的零售商人，为欧人资本家收集商情、采购原料和推销商品。这两方面的人员，很难得之于当地土著，而华侨无论从数量和素质，都是殖民者所需求的适当对象。随着中国国内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和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我国移居海外的人数日益增加，形成今日散布全球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群体。

二、华侨历史的上限

中国人移居国外，作为一种群体现象、经常现象出现于社会历史中，形成华侨历史，究竟始自何时（即华侨历史的上限）？中外侨史专家看法不一，迄今仍在探索研究，但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1. 东南分期法

以海路为主移居东南亚各国的历程，来研究华侨历史何时开始，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叫做“东南分期法”。国内相当一些专家采取此法，但他们对侨史的上限的看法也各执己见。比较有影响的见解有二：一种认为华侨史自唐朝起始；一种认为自南宋开端。前者的依据是：唐代南海交通贸易空前发达；华侨被称为“唐人”，说明当时已有大量中国人移居海外，并引用中外史籍（如杜环的《经行记》和尔马素地的《黄金牧地》等）作为论据。后者的理由是：宋代的经济重心南移，闽粤人口激增，没有土地可耕的村民被迫持续不断飘泊南洋；商品经济（主要是经济作物和轻纺产品）空前繁荣，导致纸币问世（纸币流通比欧洲早几百年），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三大发明都在宋代，特别是指南针的应用使造船、航海技术有长足进步，中国人的船只用指南针比阿拉伯海、地中海航船早得多，这时候除传统的西洋航线外，我国水手又开辟了通往菲律宾、婆罗洲诸岛的东洋交通线，为华侨大量出国提供舟楫之便。笔者比较赞同后者的学术创见，因为这方面的史料较前者充分、可信。

2. 东北分期法

则以陆路为主移居西亚、东北亚各国的历程，作为研究侨史上限和分期的导向，显然与“东南分期法”不相同。这种主张的学者虽不多，但他们提出值得思考的新见解。

“东北分期法”认为，中外陆路交通比海上交通发生时间要早，如夏朝外贝加尔湖（今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与我国黄河流域就有陆上往来；但华侨从中国西北陆上移居外国这种历史现象发生于两汉时期，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

从我国东北方面看，这里也是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发源地之一。秦末汉初，燕国人卫满带领千余人亡命于朝鲜（大约在公元前 226 年秦破燕后），开创了古代辽宁人移居国外的新阶段。

史载卫满于公元前 194 年（即汉惠帝刘盈元年）夺取朝鲜政权，自立为王，采取“诱民政策”，移居朝鲜的中国人日益增加。因此，两汉时期辽宁籍华侨移居朝鲜是中国华侨史的开端，比“东南分期法”中的始于唐代一说，至少要早 400 年左右。

然而，辽宁籍华侨并非以移居朝鲜为终点，公元 2 世纪（东汉时期）以后，又不断迁入日本。日本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称旅日华侨为“归化人”。总之，辽宁籍为主的朝鲜华侨、日本华侨的形成，是中国华侨史上限的基本依据之一，说明辽宁籍华侨在我国华侨历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华侨是所在国的社会支柱

广大刻苦耐劳、诚实勤俭的华侨，与所在国的人民和睦相处，同甘共苦，受到社会的好评，连当地的苏丹土王、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特别对南洋群岛、北美大陆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侨还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与所在国人民并肩作战，流血牺牲，建立卓著的功勋。

1. 华侨对所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来西亚迄今仍然是世界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锡生产国之一，没有百多年前广大华侨在马来半岛含辛茹苦、前仆后继地种植、开采，那是办不到的。史书记载，从 17 世纪起就有大批华侨在马来各邦开采锡矿，到 20 世纪初，采锡华工约有 30 万人，马来亚锡矿几乎全部是华侨所经营。天然橡胶原产于南美洲，1876 年开始由英国人引入马来亚，是华侨陈齐贤独具慧眼，敢于在马六甲带头试种，获得成功后，带动了大家发展橡胶种植业，不过 50 年左右，就成为全球最大天然胶生

产国与出口国。陈嘉庚先生就是当年的“橡胶大王”之一。

华侨对泰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的贡献，也是该国朝野人士所公认的。首先，移居泰国的华侨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帆船制造、远程航海由华侨担任，胡椒和甘蔗的种植，锡矿的开采，瓷器、制糖、铸铁三大行业的扩展，无一不是华侨传授技艺和发挥生产骨干作用；在建筑上，像国王的宫殿、曼谷的大佛寺等，多直接仿效中国。其次，华侨也将文化艺术带进泰国，如1802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译成泰文，形成泰国的“三国文体”；泰王拉玛二世还下令翻译《东汉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和《封神演义》；泰国许多歌剧也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美国华侨在开发美国西北部荒凉地带流血牺牲，功绩卓著：一是兴建铁路，1862—1864年间，美国兴建横穿大陆的联合太平洋线、中央太平洋线两条大铁路，绝大部分工程由华侨劳工承担，先后参加筑路的华工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死亡者不下万人，可以说每英里铁路都有中国人的白骨垫基。铁路建成后，移民西进，加速钢铁工业、农业的发展，对美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挥巨大作用。二是开垦荒地，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志记载：中国工人推动独轮车，筑起堤防，将该州42.5万英亩的沼泽地开拓为良田，使每英亩地价由原来1美元升值到20—100美元。三是开矿，初到美国的华侨，干这种最繁重最危险的活计最多，为美国资本家创造数不清的财富，有人说几乎每张美国钞票都含着中国人的血和汗，绝非耸人听闻之谈！

在朝鲜的华侨为朝鲜半岛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农业方面，山东籍王姓、姜姓两位华侨从烟台运进菜种，在仁川种植（1887年左右），

使当地蔬菜业面貌一新，不到 30 年时间，就使仁川、富平一带成为供应朝鲜各地的蔬菜基地。商业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朝鲜华侨是流通领域的主力军，对促进生产发展、方便人民生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有家广东籍华侨经营的“同顺泰”商行，独家收购销售有名的朝鲜红参，信誉卓著，所发行的“银票”甚至比朝鲜政府的纸币更受欢迎，朝鲜银行 1941 年的《经济年鉴》曾这样写着：“朝鲜华侨在旧韩国时代是全盛时期，掌握着雄大的经济实力。”甚至日本统治朝鲜初期，汉城、仁川的八大家批发庄（华侨创办的），还可由中国输入江浙绸缎、川赣夏布、华北的粮棉及干菜（辣椒、大蒜等），且数量相当可观。工业方面，华侨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平安北道、京畿道等 6 个道，是当时朝鲜工业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们的原籍是山东、华北、东北，距离不远，来往极为便利；当地人工作效率较低，而日本人工资又高，大量采用华工是挺合算的。可见华侨对朝鲜工业发展也是立下巨大的汗马功劳。

最早到南非做工的华侨，大约在 18 世纪中叶。因为欧洲殖民者相继侵入非洲，残酷屠杀敢于反抗的居民，后又大肆贩卖非洲“黑奴”，造成包括南非在内的大片殖民地劳动力奇缺。据 1904 年统计，仅是好望角一地就有华侨 1393 人。19 世纪 60 年代南非发现金刚石、70 年代发现金矿，掀起一股淘金热。英国垄断资本家为独占金矿产地，挑起了 1889—1902 年的“英布战争”。约有 15 万非洲矿工的黄金产区因战火波及而纷纷离散，相继改行垦荒。金矿资本家通过英国在华的代理人从我国的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招募华工（因这个地区有煤矿，且气候似南非，工钱又便宜）。自 1904—1906 年三年中，共输送 55000 名华工到南非，成为恢复金矿生产的主力军，为南非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至于华侨在古巴、秘鲁、圭亚那、巴拿马等拉美国家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作用与贡献，不少史书都有记载，就不一一列举了。

2. 华侨与所在国人民同心协力反帝反殖

中国人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敢于抗暴、不屈不挠的民族，哪怕在天涯海角、异国他邦也绝不会改变这种优良的民族性格。因而多少世纪以来，华侨不但对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且同当地人民一道反对压迫剥削、反帝反殖、反对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菲律宾华侨为了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暴政和残酷的剥削，自1593年（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到1763年（清朝乾隆年间）的170年间，曾经掀起六次抗暴斗争，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尽管有57200多人被穷凶极恶的西班牙殖民军杀害，但起义的华侨曾经击毙了西班牙总督和西班牙区长，而且前仆后继，从未向殖民者低头屈服。

1898—1899年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多数华侨站在革命政府一边，和菲律宾人民并肩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军事侵略。他们筹措几百万比索资助革命，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英勇献身，有几位有重大贡献的华侨、华裔，菲律宾人民永远怀念他们：黎刹——他具有华人血统，祖籍福建泉州南门外上廓乡，他是名医、科学家、文学家，为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不幸被殖民者逮捕，于1896年12月英勇就义，被尊称为“菲律宾革命之父”。刘亨赐（fù）——福建南安县码头乡刘林村人，18岁（1890年）赴菲，在伯父打铁店当学徒，学会制作铁器和老式火药枪技艺。1896年菲律宾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革命队伍，成为步兵中尉，翌年他指挥部队击毙了殖民军首领佩德罗·萨瓦拉将军，并接连打了胜仗，晋升为上校，1898年因

动员华侨捐赠几十万比索给革命军，成绩显著，被授予准将军衔，菲律宾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宝阿将军。1926年他逝世时，菲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并命名一个村镇为“宝阿”（Paua）以纪念他。王彬——他祖父是福建省晋江县人，他本人有3/4的中国血统。由于经营百货业有方，成为马尼拉的富商之一。他曾因大量财物赞助菲律宾独立而被殖民当局逮捕，出狱后仍然坚决支持革命，深受菲律宾人民的爱戴。1910年病逝，后来马尼拉市议会决定将华侨聚居的沙克里斯蒂亚街（St. Sacristia）改名王彬街，并在街口建立名为“中菲友谊门”的纪念牌坊；1973年又在友谊门建立王彬的铜像和纪念碑，供人瞻仰。

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红溪事件”（又名“红河惨案”），是发生于1740~1743年的一次华侨和印尼人民联合反抗荷兰殖民主义残暴统治的起义。当时咖啡、蔗糖生产“过剩”，荷兰占领下的印尼发生经济危机，殖民者制造种种事端掀起排华恶浪，1740年7月下令：被认为可疑的华侨，不论有无许可证，都要逮捕待审；诬陷“服鸟衫裤之唐人……日间为好人，黑夜即为贼”，“若见服鸟衫裤者，俱皆擒拿”。同年10月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命令将所有在押华侨连夜用船装运出海，绝大多数被杀害，其余的则被投入海中，激起广大华侨的义愤。聚集在甘达里亚（Gandaria）糖厂周围的5000多名华侨，推选黄班为首领，准备武装自卫，但被叛徒林楚告密。当局以华侨想进攻吧达维亚为借口，在吧城展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火连烧三昼夜（1740年10月8日—10日），包括在监狱里、医院里的华侨都在斩尽杀绝的范围内；殖民军头目范·田霍夫还炮轰华侨聚居的小南门外郊区，将其夷为平地。这次浩劫，约有4389名华侨殉难，鲜血使溪流变红了，人们称之为“红溪事件”。

在吧城大屠杀的危急之秋，黄班率领18000多名华侨起义